

建立“联合政府”，曾经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数年国内政治生活的主题之一，也是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寻求和平统一、共同建设国家的一次尝试。本文拟对其中的几个问题作些探讨。

一、中共为何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

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来的。中共提出这一口号，是有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的。

首先，从国内形势看，与抗战胜利前夕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有关。在中共看来，国民党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党，这个党腐败、无能，根本没有执政的资格。因此，国民党无疑应该打倒。但实际上，由于中共力量仍处于劣势，而且人民群众还没有觉悟，所以暂时还不能直接提“推翻国民政府”的口号，还要等待，还应当继续合作，在合作中改造它。关于这一点，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的一次报告中讲得很清楚。他说，既然国民党这么坏，为什么不提革命的口号，还要提与它合作呢？“原因是日本人还在面前，这是基本原因。外国人也要它”，“不要轻视国民党的力量，虽然它已经没有希望了，但还有相当大的反动力量。”另外，还要“照顾群众”，“群众还未觉悟，就要等待”，“现在要讲必要的等候，所以提‘改组政府和改组统帅部’的口号”^①。毛泽东还提出，联合政府的实质就是“洗脸”政策，也就是以和平的办法演变国民党政权，使中国走上新民主主义的道路。

其次，与欧洲一些国家共产党参加政府、与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联合政府的经验与做法有关。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东德等国家先后成立了共产党或工人党为主体，包括各种政治力量的带有联合政府性质的临时政府。1945年5月，法国在英美盟军的帮助下获得解放。法国解放后，法国共产党领袖多列士奉行“只能有一个政府，一支共和国军队和警察”的政策^②，将法共领导的几十万游击队并入正轨军，归戴高乐领导的临时政府国防部统一指挥。在此基础上，法国于1945年10月举行议会选举。法共获159席，

^① 转引自郭德宏：《建立联合政府方针的提出及围绕它进行的谈判和斗争》，《北京档案史料》1990年4期。

^② 沈炼之主编：《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68页。

論「聯合政府」的幾個問題

文／王小滿
张学继

成为全国第一大党；人民共和党获 152 席；社会党获 142 席。11 月 21 日，组成了以戴高乐（无党派）为总理的三党“联合政府”。战后法国，用民主与和平的方式迅速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与团结。

由于法国的情况与中国的情况较为近似，所以法国的成功经验特别为中国各派政治势力所注目和向往。1944 年 11 月 14 日，在重庆《宪政》月刊举行的第十次宪政座谈会上，沈钧儒即向《宪政》月刊建议：“希望以后多登载些最近欧洲各复兴国家成立联合政府的经过和资料。”^① 1945 年 8 月，重庆大公报馆出版了一本《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诞生》的小册子。该书前言写道：“这本小册子……意在使国人能增进对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认识与了解。同时，法国的团结与复兴，也是值得我们借镜的。”^② 对于法国的经验，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也很推崇。他说：“法国以民主的方法迅速解决了内部问题，从而迅速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也必须用民主的办法解决内部问题，使中国在战后得到应有的国际地位”，“法国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③。法国的经验也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关注。毛泽东在谈及中共今后的斗争道路时指出：“‘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最大困难，现在就要实行了。希腊、法国的共产党人得了雅典、巴黎，但政权落在或主要落在别人手里；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局面，联合政府的几种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④

再次，美苏对华政策的推动。二战后期，世界局势已经明朗。中国成为美苏两大强国在远东地区争夺的焦点。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出发，认为必须使中国“成为统一的自由的民主国家”，以便将中国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并使中国成为“遏制苏联势力向亚洲地区扩张”的主要屏障。美国政府认为，实现这一战略目的存在两个主要障碍：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存在，“自治性的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那样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且实际上使政治团结不能实现”^⑤。二是国民党是“一党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针对上述情况，美国政府确定的对华政策目标是：一方面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加强国民党政权；同时敦促国民党政权实行民主改革，开放政权，吸收各党派分子参加政府，建立类似欧美的“代议制”的“联合政

府”。然后，在此基础上，整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以实现全国的统一。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先后派赫尔利、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关系，以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美国政府曾经这样设想：“有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会给中国树立一个有效的对立面，有助于实行民主政府。联合政府中的小党有时会和国民党持同样的看法而战胜共产党的反对，有时会站在共产党一边，而战胜政府中国国民党的看法。这种不同政党意见的相互影响，可能使政府工作比较困难，但能促进民主事业。”^⑥

中国的北方强国苏联，一方面不愿意中国成为完全受美国支配的附庸国，因此苏联支持中共以对抗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对国民党的力量估计过高，而对中共力量则一直估计不足，害怕过分支持中共而引发美苏直接冲突，因而又尽量寻求同美国的妥协。美苏在幕后几经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如下交易：（一）苏联政府同国民政府签订一项同盟条约，表示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在中国领导地位的支持；（二）美国政府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特殊权益，以保障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因此，苏联在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希望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参加以蒋介石为领袖的联合政府，避免内战。

“国共反映美苏”，美苏两大强国的对华政策深深地影响和制约着中国抗战胜利前后的政治局势的发展。

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尝试，就是在上述背景下进行的。

二、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对“联合政府”口号的反应

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是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

① 《中国应如何运用美国罗斯福连任总统后的世界新局面——本刊第十次座谈》，《宪政》月刊第十二、十三号合刊。

②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诞生·前言》，重庆《大公报》1945 年 8 月编印。

③ 《孙院长昨发表谈话》，1945 年 2 月 16 日《新华日报》。

④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编写组：《重庆谈判》，《光明日报》1994 年 1 月 7 日。

⑤ 《中美关系史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3 页。

⑥ 《顾维钧回忆录》中译本第 6 册，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383 页。

线政策的形成、发展而逐渐形成的。“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最早见于毛泽东1944年8月写的一段评语,其中说:“应与张(治中)、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⁹9月1日,中共第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向国民党提出召集各党派代表会,成立临时联合政府的要求。这个要求由林伯渠于9月13日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四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正式提出。林伯渠在发言中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第一次将“联合政府”的主张公诸社会。1945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24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设想。在报告中,毛泽东首先分析了成立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他指出:“英美苏三大民主国之间的团结是统治一切的”,“这是一个决定一切的条件”。从此,“国际间的重大问题,必须以三大国或五大国为首的协议来解决。各国内部问题,无例外地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毛泽东意识到,世界形势要求中国在团结中求统一,而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接着,毛泽东指出,成立联合政府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在抗战胜利以前,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及无党无派一切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第二步,在抗战胜利以后,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政府。这个联合政府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即“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毛泽东认为,解放区的政权是地方性的联合政府,是未来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模型^①。

中共将“联合政府”的主张向社会公开后,在全国各阶层人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小册子,在重庆发行了3万册。中间党派首先起来表示响应和支持。1944年10月10日,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1945年10月,民主同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大会提出“要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为此,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计划化”的建国方案。具体说,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多地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实行议会制、责任内阁制、司法独立与地方自治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地

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以实现经济的自由平等。大会认真研究了“联合政府”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大会认为:“联合政府是中国和平、团结、统一的唯一途径。”“是实现军队国家化,彻底消灭内战,平息党争的唯一枢轴”^②。

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当权派中的一部分人也倾向于用联合政府的办法解决国共问题。国民党民主派包括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李济深等,但他们没有实际权力,形同在野派,对国民党的决策影响不大。

国民党当权派中的孙科、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张群、于右任等人也都倾向于用和平的办法解决国共争端。在这些人中,对“联合政府”鼓吹最力的当推立法院院长孙科。孙科是孙中山的儿子,在国民党内有着特殊地位。国民党自蒋胡汪“三驾马车”体制瓦解后,形成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但孙科凭借其特殊地位,成为国民党当权派中敢于与蒋介石“立异”之一人。他经常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鼓吹“政治民主化”、“经济计划化”^③,俨然是国民党“民主派”的领袖。1944年5月5日,孙科创办《民主世界》杂志,该刊标榜“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锋,是自由的号角”^④。其宣传基调是鼓吹“建立一个民主的代议政府,以实现孙逸仙博士的理想”^⑤。对于中共问题,孙科主张“用开明方法求解决”^⑥,坚决反对使用武力。孙科指出:抗战胜利以后,如再打内战,一是“未必有绝对胜利的把握”;二是“世界情势不许我们打”。所以,“国内问题只有用政治方法求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孙科主办的《民主世界》还载文警告说:如果国共不幸兵戎相见,那么,“其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亡,民主与统一均成泡影,抗战的血汗所换来的国家独立与自由亦必全部牺牲,陷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东北大连大众书店1946年版。

^② 陈竹筠等编:《中国民主党派历史资料选辑》上册,第24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③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1944年8月18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

^④ 《告读者》,《民主世界》第2卷8、9合刊,1945年5月1日出版。

^⑤ 孙科:《三民主义新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8页。

^⑥ 同上,第67—68页。

之境”^①。从上述前提出发,孙科赞同用“联合政府”的办法解决国共争端。孙科认为:“联合政府是遵循民主的方式,在各党派是参加政府共同负责,加强政府的效能。”^②孙科认为:这个“联合政府”应当有一个各党派共同遵守的纲领,其要点是:(一)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二)承认中国国民党为现在第一大党居领导地位,同时承认各党派都应该参加政府共同负责;(三)承认蒋主席是我们全国的领袖;(四)全中国的军队都应当促使其国家化。孙科认为,只要各党派遵守上述原则,“就可以达到团结统一的目的”^③。

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强硬派则强烈反对“联合政府”的主张。蒋介石在看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后,说这是他有史以来最大的耻辱。蒋的高级谋士陈布雷在看了报告以后,也说只是两个字“内战”^④。蒋介石还声称:“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⑤因此,蒋介石对“联合政府”始终采取了严加拒绝的态度,并以“军令统一”、“政令统一”来对抗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的要求。由于蒋介石的强硬立场,抗战前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三、“联合政府”方案是怎样形成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从此,如何解决国内统一问题就成为时局的焦点。

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鉴于以往蒋介石一直对“联合政府”持严拒态度,为使谈判能够达成协议,中共决定暂时不提联合政府的要求。经过长达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签订了《国共会谈纪要》,双方确认“坚决避免内战”,“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商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事。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及无党派五个方面的38名代表。会议就政府组织、和平建国纲领、军事、国民大会与宪法草案等问题达成了五个书面协议。

以往的历史教科书一直强调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左、中、右三种势力。左派是中共代表和部分无党派代表,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主张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中间党派是民盟代表(国社党除

外)和部分无党派代表,他们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幻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右派是国民党、青年党、国社党和部分无党派代表,他们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坚持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在政协会议中,中共采取了团结中间派,揭露与孤立右派的方针,从而使政协会议达成了有利于人民的协议。因此,政协协议是中共与民主党派密切合作的结果。

如果上述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左派应是中共7位代表加无党派的李烛尘、郭沫若,共9人;中间派应是民盟7位代表加无党派3位代表,共10人;而右派则应是国民党8位代表、青年党5位代表、国社党2位代表以及无党派的王云五、胡霖、傅斯年、莫德惠,共19人。显然,右派代表人数最多。而按照政协协议会议规则,任何一方面只要握有五分之一的反对票,议案即不能成立。因此,右派在事实上始终掌握了否决权。如果他们始终坚持“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那么,政协会议就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而且事实上,政协通过协议必须“事事均须一致”,只要一方不同意,就“足使一切多数之意见不能生效”^⑥。因此,前述说法不能成立是显而易见的。

笔者认为,政协会议上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所持的政治态度的差异是存在的,各党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也是事实。但这与政协协议的通过没有必然内在的联系。政协协议之所以能够通过,有以下一些原因:

一是美国特使马歇尔的干预。政协会议一开始,由于各党派的主张尖锐对立,争论异常激烈。经过十多天的讨论,进展非常缓慢。这种情况引起了马歇尔的不安。1月22日,马氏秘密拜见蒋介石,向他提交了一份由马氏本人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主张立即成立各党派参加的“临时国务

① 钟天心:《理智的抉择》,《民主世界》第3卷2期,1945年5月16日。

② 《孙院长昨发表谈话》,《新华日报》1945年2月16日。

③ 《孙院长之负责声明》,《民主世界》第2卷第4、5期合刊,1945年3月1日。

④ 转引自郭德宏:《建立联合政府方针的提出及围绕它进行的谈判和斗争》,《北京档案史料》,1990年第4期。

⑤ 《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29页。

⑥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1946年1月26日。

委员会”，以取代国民党一党的最高国防委员会。马氏明白告诉蒋介石：“绝对必要与共产党人尽早就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和军队达成一项协议”^①。马氏警告说：“美国陆战队不可能长时间留在中国，国民党在西北和东北的地位都已因苏联而严重削弱，如不采取变通办法，目前的中国将很容易受到苏联下层渗透方式的损害，从而使共产党的制度变得强大起来。”^②蒋对马歇尔的方案非常反感，并认为是“为共党所不敢提者”^③。但慑于杜鲁门声明的威胁和马歇尔掌握着援华大权，不得不虚与委蛇，表示“目前可如此去做”。之后，国民党代表被迫在政协会议上作出重大让步，使协议得以通过。因此，蒋介石允许政协协议通过是被迫的，言不由衷的。事实上，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履行这些协议。

二是中共的让步。政协通过的协议与中国共产党人原来的主张明显地“存在着距离”^④。但中共认为，政治解决只能是互相妥协，因而也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相应作了让步。这一点，周恩来在会后答记者问时作了明确说明。他说：和平建国纲领与我们原来的提案有距离，政府改组我们主张国民党最多不能超过三分之一，结果占到半数，国民大会旧代表我们主张重选，而现在只是增加了部分党派名额。

三是国民党代表孙科企图利用政协之机，限制蒋介石的独裁。孙科素来不满蒋介石一人独揽的作风。政协会议时，孙科担任国民党代表团首席代表。他认为，联合政府成立后，总统一职非蒋莫属。于是孙科便决定利用政协讨论宪草之机，缩小总统在宪法上的职权，实行责任内阁制，以此来限制蒋介石的独裁。

1月9日，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宪法草案。首先由孙科对国民政府所提交的“五五宪草”作说明，并声明：“国民党并不以此宪草为天经地义，一字不可易，希望大家研究修改。”^⑤“五五宪草”提出后，遭到中共和中间党派代表的强烈反对。他们指出：“五五宪草若成为正式的宪法，将是世界上第一部最不民主的宪法。”^⑥经过协商，各方代表推国社党的代表张君勱重拟宪法草案，作为政协“讨论之底稿”。张君勱早年先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从清末开始就投身于资产阶级立宪运动，是著名的自由主义分子。此时正担任民盟中央常委。张君勱受托起草宪法草案后，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改造国民党的“五五宪草”，使之成为具有民主精神的宪法。张君勱说，他草拟宪法草案的基本思路和精神是：“在调和中山先生五权宪法与世界民主国宪法之根本原则。

中山先生为民国之创造人，其宪法要义，自为吾人所当尊重。然民主国宪法之根本要义，如人民监督政府之权，如政府对议会负责，即各国通行之制，自为吾国所不能自外。”^⑦张氏宪草，形式上仍是孙中山的五权制，但实际上，立法院变成了英国式的会议院，行政院成了“纯粹的责任内阁”，行政院长相当于英国的首相，总统相当于英国的女王。对于张君勱的设计，不仅中共和中间党派表示同意，孙科也表示支持。孙科主办的《民主世界》杂志还称：“协商会议的结果在原则上可以说和我们的主张不谋而合。”^⑧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修改，据蒋介石后来说：他于“事前未能评阅条文，在协议决定以前，不及向本党（即国民党）代表贡献意见，以相商榷。”^⑨因此，政协宪草完全是由孙科、邵力子等人作主通过的。正因为如要，所以国民党强硬派后来攻击说：国民党“被孙科出卖了”^⑩！

四、国民党统治集团推翻政协协议

政协协议遭到了国民党内强硬派的激烈反对。强硬派声称：政协协议“是国民党的失败”。^⑪他们叫嚷：“不能把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⑫1946年1月31日，国民党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审核政协协议，谷正纲激烈反对，以“至于流泪”^⑬。

① 《美国特使在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8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9卷，第141、143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卷(5)第71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

④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2月2日。

⑤ 沈云龙：《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5页。

⑥ 天津《大公报》社评，1946年2月26日。

⑦ 张君勱：《中华民国未来民主宪法十讲自序》，上海《再生》第128期，1946年8月31日出版。

⑧ 钟天心：《理智的抉择》，《民主世界》第3卷2期，1945年5月16日出版。

⑨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2)，第487页。

⑩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页。

⑪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14日。

⑫ 陈旭麓主编：《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06页。

⑬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1946年1月31日。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强硬派将二中全会变成了“反对政治协商会议的讲坛”。^①据当时报纸透露,对于政协通过的五项协议,全会讨论时“多持异议”^②。而政协宪草尤为攻击的焦点。1946年2月10日,蒋介石约集国民党中央负责人谈话,对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发表了12项意见。他认为“宪草所决定之原则与总理遗教出入颇多”。“今协商会议虽接受三民主义,而对五权宪法则多所改易。如此则本党不啻自己取消其党纲,而失其存在之地位,且亦无以对已往为革命而奋斗而牺牲之先烈与军民。故余为此事,实甚彷徨不安。”^③蒋介石的言论,对宪草进行了全面攻击。在他的带头下,国民党内攻击宪法草案的言论一蜂而起。强硬派认为,中国将“因宪法而宣布解体”^④。他们反对三权分立和多党内阁制,认为“这足以造成政局的不安定”。他们反对“省得制定省宪”的主张,认为这将“支解中国为无数独立国家”,“足以造成‘封建割据’的局面”^⑤。对于政协宪草,就是国民党内赞成与中共和解的自由派人士王世杰也认为“确多不妥之处”,他甚至因此而埋怨当时支持通过政协宪草的孙科、邵力子两人“轻忽将事”^⑥。由此看来,国民党内对政协协议持肯定态度的只占极少数。

强硬派还对参加政协会议的孙科等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声称要撤销他们的代表资格并加以处分,以致国民党“民主派”“栗栗有作‘廖仲恺第二’之惧”^⑦。

面对强硬派反对政协协议的鼓噪,孙科等人多次发表文章和谈话,试图维护政协协议。孙科指出:政协会议“成就很大”,“政协会议的成功,是国民党的成功,也是国家的成功”。他批评强硬派“头脑不行”^⑧,并告诫他们:对政协协议要“绝对避免作恶意的推测”^⑨。孙科派的钟天心也在《民主世界》上撰文,呼吁遵守政协协议。他指出:国民党在政协会议中“所作的让步不过系一部分权利和名位而已,如果让出一部分的权利和名位,可以避免人民的流血,可以换得国家的和平与统一,我们又何乐而不为?”^⑩。当时舆论也寄希望于国民党内的自由分子,希望他们起来“推动整个国民党向着民主的路径前进,以救党、以救国”^⑪。然而,国民党内自由主义分子的力量毕竟太小了,他们根本无力扭转局势的逆转。

在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公开号召对政协协议“就其牵牵大端,妥筹补救”^⑫。在这一原则下,二中全会最后通过五项决议,对政协五项协议进行了全盘修正。从而推翻了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的民主原则。

二中全会还规定:“各党派推选的国府委员要经国民党中常委任选。”这些修正,推翻了各党派联合政府的基础,“把各党派参加政府变成请客”^⑬。对此,中共与民盟断然拒绝参加。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宣布召开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公开宣布与中共及民盟决裂,“联合政府”的谈判走入死胡同。剩下的问题便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如何在战场上见高低了。

五、蒋介石为何反对“联合政府”?

欧洲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功地建立起了“联合政府”,从而避免了社会的再度大动乱。为什么中国的“联合政府”建立不起来?

对于这个问题,在40年代就有许多人做过分析和探讨。综合起来,不外乎以下一些看法:一是由于国内两党主义的冲突;二是国际间两大集团的对立对中国的影响;三是由于国共两党历史的积怨等等。^⑭时隔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因素值得注意:

第一,国民党当权派“恐共症”的影响。

在国共关系史上,国共两党有过从合作到破裂,再到相互敌对的曲折经历。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两党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残酷厮杀。抗

①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10日。

②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12日。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2),第487页。

④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2日。

⑤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14日。

⑥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1946年1月31日。

⑦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10日。

⑧ 《孙院长谈东北问题》,《新华日报》1946年3月11日。

⑨ 孙科:《新时代的开始》,《民主世界》第3卷第1期,1946年5月1日出版。

⑩ 钟天心:《理智的抉择》,《民主世界》第3卷第2期,1945年5月16日出版。

⑪ 子敬:《自由分子与少数党派》,上海《再生》第151期,1947年2月15日出版。

⑫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21日。

⑬ 《张澜发表重要谈话》,《新华日报》1946年3月21日。

⑭ 陈彦:《国共问题何以不能和平解决的追索》,《观察》周刊第2卷第24期,1947年8月9日。

战爆发后,大敌当前,国共两党不得不再度携手、共御外侮。但即使在这时,双方心理上始终存在着严重隔阂,以致摩擦冲突不断发生。由于这些不幸和痛苦的经历,使得国共两党彼此都对对方抱有强烈的疑惧和戒备心理。相互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感。就在重庆谈判后不久,毛泽东就在一次党内高干会议上说:“积十八年之经验,深知是这么一回事,国共两党一定谈判不好,一定要打仗,一定要破裂。”^①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也认为,要蒋介石放弃灭共企图不可能。因此,他建议中共中央可以利用谈判作为合法斗争的讲坛,但是不要指望谈判会取得成功。^②

而在国民党方面,据孙科分析,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经验,使得国民党内一部分人早已成了“惊弓之鸟”,患有严重“恐共症”^③。本来,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这些西方的政治原则并不是中共追求的最终目标,而只是与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的工具。相对而言,中共具有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有铁的纪律)的优点,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CC系首领陈果夫反对“联合政府”的理由中得到证明。政协会议期间,病榻上的陈果夫忧心忡忡,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国民党“党的组织不如人,党的宣传不如人,党的训练不如人”,“党无基础,共党如来合作,则我危险”^④。1946年1月20日,法国联合政府总理戴高乐被迫辞职。22日,陈果夫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后,对法国“共党势张”深感不安。当即写信给蒋介石,阻止与共产党合作。陈果夫声称:“政治协商会议必无好结果。且无论如何共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中国如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均未健全之际,颇有重蹈覆辙之可能。请临崖勒马,另行途径。”^⑤

不仅陈果夫等人害怕与中共和平竞争,蒋介石也是如此。早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向蒋介石提议,共产党和国民党组织一个联合的同盟,国民党是一份,共产党也是一份,各有独立的组织。共产党进到国民党里面去,同时共产党保持其独立的组织。或者象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一样^⑥。对于中共的这一提议,蒋介石却认为:“这是中共企图第二次大规模渗透本党的阴谋。我们依据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的惨痛经验,是不能再上当的了。”^⑦对于中共的“联合政府”主张,蒋介石也认为,“是一个政治口号和一种渗透与颠覆的政治战术”^⑧。1945年9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恨恨地写道:中共“以组织联合政府为过渡手段,而达到其多数控制,成立其第四国际专政之目的。”^⑨1948年6月下旬,蒋介石与张

治中谈了7天,就形势问题交换意见。当时,国民党在战争中已明显处于劣势,到了失败的边缘。对此,张治中再次向蒋介石提出:先与共产党停战,然后再谋善后之道。但蒋介石却回答道:“共产党混进来之后,发展它的组织和地下活动,我们还受得了吗?!”^⑩再次拒绝了张治中的建议。

由此可见,国民党当权派大都患有严重的“恐共症”,他们感到,与中共和平竞争,国民党不是对手;若让中共参加联合政府,迟早政权要落入中共手中,国民党当权派就是在这种先入为主的意识支配下打定主意不跳中共布下的“联合政府”这个“陷阱”。试想,国民党当权派在这种对中国共产党的恐惧心理状态下,怎么能够希望它与中共合作呢?

第二、找不到政党与武力分离的妥善办法。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政党,这是无疑的。但是,中国国民党也自称是一个“革命政党”。革命政党的基本特点:政党与武力高度结合,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武装集团。国共两党都有各自的军队。如何使政党与武力分离,这是“联合政府”能否建立的前提条件。针对这个问题,各党派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各自的方案:

蒋介石的方案是:“你交出军队,我就给你们民主。”^⑪也就是要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但是中国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58页。

② 《周恩来年谱》,第629页。

③ 孙科:《三民主义新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60页。

④ 徐咏平:《陈果夫传》,台北正中书局1980年版,第935页。

⑤ 徐咏平:《陈果夫传》,第931页。

⑥ 《周恩来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7—198页。

⑦ 《蒋总统秘录》第12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版,第74页。

⑧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422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

⑨ 《自记中共历年之“罪行”》,《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第323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

⑩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74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⑪ 《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与根本方案》,1946年1月23日《解放日报》社论。

的情形与法国不同,中共不是法共,毛泽东也不是多烈士。在国共长期的残酷厮杀中,毛泽东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指出:大革命时期,由于中共只掌握了少量军队,结果蒋介石一发动政变,共产党的“自由也光了”^①。对历史的伤痕记忆犹新的中共,不可能在军队问题上作出让步。针对蒋介石的企图,毛泽东明确声明:“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②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再次向全党发出指示,明确指出:“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即使将来整编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③1946年2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整军方案。毛泽东指出:“全国军队统一,原则上我们只好赞成,实行步骤要看具体情况,这是我们与法国不同的。”^④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共不可能效法法共,通过与资产阶级的政党结盟,在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的基础上,放弃军队走上议会斗争的道路。中国不可能简单地重复法国的模式。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共试图找到一条既能够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又能够确保自身地位与安全的可靠办法。中共的一切努力都是围绕着这一点而进行的。

中共的方案是先政治民主化,后军队国家化。所谓军队国家化,其含义就是改造国民党反动军队。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必须做一项责无旁贷的工作,这就是将国民党政府那些在对日作战时经常打败仗的、以反对人民、排斥异己与准备内战为目的军队,加以改造,变为人民的军队。”毛泽东还认为,这项工作应当由全国人民及一切民主党派来做。^⑤1946年1月23日,《解放日报》社论更明确指出:军队国家化“是要把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化为民主制度的军队,而不是要把民主制度的军队化为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是要把党阀制度和军阀制度的军队化为人民的军队,而不是要把人民的军队化为党阀制度和军阀制度的军队。”^⑥

中共与国民党的方案针锋相对,显然找不到任何妥协点。

第三方案是中间党派民主同盟提出来的,就是国共两党都放弃党军,把军队交还给国家。民盟认为,国共两党都有自己的党军,这是实现联合政府的障碍,只有军队“超然于党派斗争之外”,“民主政治才能获得有效的保证”^⑦。中间党派的方案貌似公允,不偏不倚。但正如吴玉章所指出的:“在这两条原

则的尖锐斗争中,有些中间派人士居然想走‘第三条道路’,他们幻想国共双方都交出军队,由他们来代表‘国家’加以接收。但是,天地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呢?他们的幻想落了空。”^⑧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要实现党与军队的分离是做不到的。因此,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式的联合政府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如果退而求其次的话,倒是存在着另外一种比较现实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在中央政府民主化的前提下,国民党管理国统区、共产党管理解放区,并各自管理自己的军队,两党进行和平的合法的竞争。我们从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斗争中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看,确实也隐含有这个意思。据说,在国民党方面,王世杰也曾向蒋介石建议过:“我国如于对日战争结束后,续有一个五年至十年的战争,则一切建国之业势将无期地搁置,前途不堪设想。假使我政府对中共作重大让步,求取和平,在假统一之形式下,暂取分疆而治之策。自亦有诸多困难与危险,但比较的大危险程度,似尚较小。”^⑨当然,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和平与统一只能是暂时的、不确定的。随着环境的变化,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但事实上,这样的方案也没有为蒋介石所采纳和接受。

英国上议院在辩论对华政策时,有一位议员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除非共产党可以保留他们的军队,允许中共在联邦的中国范围内,若干部分能够独立,能够管制他们自己的经济;否则,我们不能希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973页。

②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4卷第1059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166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7页。

⑤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东北大连大众书店1946年版。

⑥ 《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与根本方案》,《解放日报》1946年1月23日。

⑦ 澄之:《展望中国民主》,《自由论坛》第3卷3期,1944年11月1日。

⑧ 《政治协商会议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1页。

⑨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1945年11月9日。

望共产党与国民党组织任何联合政府。”^①这个分析应该有一定的合理性,至少在一定时期是对的。

第三、蒋介石对国民党军队力量的错误估计。

当时,国民党内普遍有这样一种乐观的估计,即共产党“绝对没有力量将国民党的政权用武力打倒”。^②据王世杰日记记载,蒋介石曾很自信而骄傲地对周恩来说:中共不能推翻国民党和我(指蒋介石本人)。“因此,必须与国民党彻底合作。”^③1946年5月下旬,东北四平战役结束后,蒋介石亲赴东北视察,并召集前线将领,询问他们:共产党的战术,究竟比在江西的时候有什么进步没有?各将领一致认为:无论在四平街,在本溪湖各战役,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大进步。^④由此,蒋介石断言:中共“并无什么多大的实力。”从而更鼓舞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信心。6月12日,徐永昌向蒋介石建议:“力量如其胜任,应即向共逐渐进攻”。29日,蒋介石召集戴季陶、邹鲁、王世杰、白崇禧、陈诚等商议说:与中共“既决裂之,不许可再延期,亦无必要顾虑种种。”^⑤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就这样决定下来。

蒋介石在挑起全面内战后,扬言战争“一定能速战速决”^⑥。蒋的参谋总长陈诚更大胆,扬言“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问题”^⑦。但实际上,国民党的力量远非如蒋、陈吹嘘的那样强大。战争的结果,国民党一败涂地,不到四年,就被中国共产党赶出了大陆。这样的结局,恐怕是蒋介石与陈诚所始料不及的吧!

第四、世界冷战格局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由战时的合作逐渐演变为公开的对抗。以美、苏两大强国为中心,世界局势形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局面,世界冷战格局基本形成。一国之内,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政党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反观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成立的类似联合政府的欧洲国家,为时不久即纷纷宣告瓦解。在东欧、中欧和南欧一些国家,共产党凭借其实力将资产阶级政党清除了政府;而在法国,则是资产阶级政党凭借实力将共产党排挤出了政府。无一例外地,变成了无产阶级政权或资产阶级政权。可以设想,即使中国在二战末期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建立了类似的“联合政府”,也不可能长久维持,最终会走上武力解决的道路,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因此,以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历史的唯一选择。

欢迎订阅《安徽史学》

《安徽史学》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学术性刊物,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之一。立足安徽,面向全国。设有史学理论和评论、淮系集团研究、太平天国研究、明清史研究、楚史研究、家族史研究、安徽历史人物、历史教学、史坛争鸣、史学沙龙、当代史研究等栏目。适合于史学研究者、地方志研究者、大中学历史教师、文博工作者和文史爱好者阅读。

《安徽史学》为季刊,16开,96页,每期定价2.40元,全年订价9.60元。国内统一刊号CN34—1008K,邮局代号26—9,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也可随时向本刊直接订购。本刊地址:合肥市卫岗省社科院内,邮政编码:230053,电话:3421171—2806。本刊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南七城市信用社,账号:105816075。

《抗日战争研究》简介

《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为国内专门研究抗日战争的学术季刊,大三十二开本,每册21万字,256页。由邮局发行。

《抗日战争研究》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

《抗日战争研究》发表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成果。以论文为主,同时发表评论、综述、史料、考证、读史札记、书刊评介、译文、信息等各种形式的研究成果和文章,包括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为止,中国抗日战争各方面的内容。

《抗日战争研究》的作者队伍比较广泛,除大陆的学者外,还有中国台湾的学者,并有国外学者,如美国、日本、俄罗斯、加拿大、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学者。

① 毅生译:《英上院激辩我国局势详情》,上海《再生》第151期,1947年2月15日出版。

② 钟天心:《理智的抉择》,《民主世界》第3卷2期,1945年5月16日。

③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1945年2月14日。

④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821页。

⑤ 《徐永昌日记》1946年6月12日、17日、29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

⑥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页。

⑦ 《中央日报》,1946年10月18日。